

新质生产力与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 张 林

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现代化驱动发展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状况,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质量互变,以物质现代化为基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它能够以科技现代化这个“关键所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它能够以“首要任务”驱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质生产力也是为美好生活服务的生产力,它与中国式现代化拥有人民至上的共同价值驱动力,而以新型发展方式和新发展格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在深层逻辑上成为二者内在的发展趋势、价值驱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充分激活和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科技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4)03—0015—10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4.03.007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的发展要求。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2]的新要求。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高质量新型生产力,具有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性、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性等特征^[3]。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从低质到高质迭代升级和催化融合的过程,就是驱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加快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整体改善,进而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理论创新、时代价值、实践路径等关键问题作了许多建设性研究^[4-6],但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质量互变规律、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尤其对于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能”价值尚缺乏深入研究,而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发展要求的明确,关键指向在于鲜明的“动能”价值。同时,目前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问题,也提供了诸如目标导向力、理论引领力、政党领导力、制度保障力、改革内驱力、文化内蕴力、精神支撑力、情怀感召力等观测维度^[7-8],而对于这些动力内部的逻辑关联以及动力系统根本驱动力的认识,还需从更深层次加以剖析。

经济研究往往不是抽象、孤立的,而是具体、联系的,将新质生产力的探讨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思考会获得新认识。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是由内源与外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资本有序发展研究”(23CKS038)

作者简介:张林,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物质与精神、理论与制度、政党与人民、价值与情感等复杂动力系统驱动发展的,其中最基础、最根本的动力还是由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传导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9]274}可以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必须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生产力的基础上加以认识。马克思在1843年到1844年的“巴黎笔记”中首次使用了生产力概念。从《巴黎笔记》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神圣家族》以及《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再到《资本论》等文献,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经历了从哲学人类学到政治经济学的洗礼,最终书写了唯物史观视域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交汇融合的概念图景。马克思扬弃费尔巴哈和赫斯在哲学思辨范畴上的主体间抽象的交往性的“共同活动”概念,同时批判借鉴李斯特等关于生产力“功能性的水平概念”^[10],使生产力话语不再凌空于哲学的玄思之上,而是以经济学研究为基础,以人的现实“生产活动”为客观依据,敏锐捕捉到现代工业及其分工协作产生的巨大客观力量,用“工业”的客观现实性消解人本主义逻辑,用人的物质生产代替精神意志,说明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马克思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1]160},列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认为:“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12]425}共产主义就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只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才能决定社会生产方式,进而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13]426}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唯物史观逻辑系统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共产主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同时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水平,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根据。列宁认为:“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12]465}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那么生产力必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基于此,列宁认识到:“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4]623}他在领导建立苏维埃政权后,随即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4]364}说明先进的社会形态必须有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作支撑。实现国家电气化,就是要为国家工农业打下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思想,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15]536},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主线,可以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上就是要推动生产力现代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是解放人民大众、解放生产力。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马克思“确认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16]18}。这一时期,我们党认识到:“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17]108}而“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17]109}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遭到破坏,农业、工业得不到发展,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就在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国的实现。政治上打倒反动势力,就是要在经济上摧毁反动的生产关系、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因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

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8][108]}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运动,我们党带领人民冲破“三座大山”的压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通过变革上层建筑,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私人垄断的资本所有权,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条件,进而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同样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重整山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上,肃清反革命分子,解放长期被反动势力压迫的广大群众,进而解放生产力。经济上,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五”计划开始实施时,党即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实质就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创造更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技术革命和使用各类机器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从而创造现代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同时并举,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着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生产力发展活力进一步释放,促使党开始提出并逐步完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基础构想。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0][483]}的战略目标。期间,毛泽东还发表系列著作着眼“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解决生产力空间布局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推进,进一步解放、保护和发展了生产力,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直接动力。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21][35]}通过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上对生产力的羁绊,也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动力问题。开放,主要是融入世界生产力大环境,吸收国外有益经验,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思想解放引领生产力解放,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十一届六中全会明晰了“落后的社会生产”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此后,破除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体制障碍,释放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成为改革开放的主攻方向。其一,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加以认识。1992年南方谈话期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373]}这一表述深刻阐明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基础性意义。其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阐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国家现代化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即提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22][276]}四个现代化建设是重点,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根本着力点。随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引领下,坚持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继承“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社会”概念,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一时期,我们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

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3][181]}新时代,我们坚持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引领,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深层清除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概括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基本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在战略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中国式现代化确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根据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际,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适应新常态,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新发展理念的目标导向、新发展格局的空间布局引领我国生产力实现总体跃升、整体改善。经过长期实践,我们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二、新质生产力的辩证运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动力

毛泽东曾说:“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24][216]}这实质上从生产力的要素方面说明了生产力发展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密切关系,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由生产力的现代化驱动的。进一步讲,生产力“量”与“质”两方面的发展,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25][302]}。因此,要从生产力自身质量互变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深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一)生产力的质量互变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生产力同其他客观物质力量一样,包括质与量的规定性。生产力的质与量两方面都有明确所指,所以当每次工业革命来临、面临每次产业结构转型时,把握生产力的质与量就成为抓住社会发展机遇的关键。从生产力的要素组成来看,对劳动者而言,“质”的方面体现为体力、智力等的发展程度,知识、技能等的密集程度,“量”的方面体现为劳动者数量和分工协作的规模;对劳动资料而言,“质”的方面体现为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使用程度,“量”的方面体现为生产工具规模数量的投入大小;对劳动对象而言,“质”的方面体现为原材料的精细、品质等,“量”的方面体现为一定质的劳动对象的多少^[3]。生产力的质与量两个方面共同构成完整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26][520]}分工程度实际上是劳动者技能程度、劳动工具的专业程度、劳动对象的复杂程度的体现,这实际上就是生产力“质”的发展程度,社会分工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现,就在于它在生产活动中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提升社会生产力,而“任何新的生产力”质的变化而非简单量的投入,都会带来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说明了生产力“质”与“量”的变化,特别是质变对于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要性。

生产力的“量”与“质”之间是辩证运动着的。从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来看,社会生产力的成长表现为:“依次继起和绵延不绝的升级换代,构成社会生产力的成长史”^{[27][96]},社会生产力呈现明显大阶段的质变是“换代”,大阶段里面的小时段的变化就是“升级”,生产力的多次量变和局部质变构成“升级”,引起全局性根本性质变的若干次升级就是“换代”。生产力的换代不仅有“量态”的飞跃,而且有“质态”的突破。当然,生产力的这种质量互变或迭代升级,主要描述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变化的纵向继承性,而处在同一时段的生产力往往还会出现横向间的流动、依附现象,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同时在场,传统生产力催生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催熟传统生产力。生产力要素的质量变化,促成生产力整体升级换

代,而生产力升级换代首先要在生产力要素中表现出来。事实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就是在生产力量与质的辩证运动中实现的,量变引起生产力水平的叠加,质变促成生产力水平的跃升。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跃升是由生产力质量互变引起的。生产力的质量互变,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力发展新旧、高低程度就是生产力量变与质变之间的临界点,量变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渐进过程的连续性,质变体现了生产力发展过程的飞跃性。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结果。若把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看作是生产力质变的结果,那么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逐步推进和深化发展则是引起质变的渐次量变。中国式现代化,基础在物质现代化。几乎没有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是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必然以生产力发展、物质技术基础提高为前提。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人们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如果缺乏足够强劲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现代化不可能成为现实”^[28]。现代化的发展,根本上就是由生产力质量的辩证运动引起的。每一次生产力质的变化带来经济效益的扩大,从而推动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规模化,又为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生产力质量的往复发展、循环提升,成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动力。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从要素构成上看,生产力中的劳动者是具有能动性的因素,生产者的生产经验积累、劳动技能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变革和发展往往还从劳动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发展开始。因此,马克思指出:“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11]352}从生产力所起的社会历史作用看,生产力更是一种革命的力量。生产力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性,它能够决定一定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关系的性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带来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变革,因而作为历史内在推动力的生产力必然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222}而且“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29]3}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生产力在其中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生产力的革命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是现实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而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关系)下进行的,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关系)既是过去生产实践的结果,也是现时生产实践的条件。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产生最初就是为着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人们“自主活动的条件”^{[11]204},对生产力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但这时并非不存在矛盾,只是矛盾还未因量变的积累上升为主要的一面。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进化及其活动结果——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激化,当初“创生”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又因相对稳定性和保守性的一面,而暴露出与生产力的矛盾,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新趋势时,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为了实现社会新的发展,人们就会重新变革生产关系,清除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障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后又开始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以此循环运动。这正是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没有看到的现实:“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30]413}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种矛盾运动为基础,整个社会形态也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规律要求执政党必须适时变革生产关系。历史地看,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社会经济基础,阶级剥削制度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自我完善和发展能力的制度,其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就是社会主义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23]65}党的二十大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

强调要：“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23][2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完善各领域体制机制，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趋势。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同时，开放也是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三、新质生产力的多维蕴含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动力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存在诸多一致性。在内生逻辑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在理论的指导思想、历史的发展进程、实践的创造过程上具有一致性，而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上就是由生产力现代化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源性动力与新质生产力出场的内生逻辑具有一致性。在外显特质上，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性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而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就在科技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在价值目标上，坚持人民至上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价值驱动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样也是二者内在的发展趋势、价值驱动。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生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过程具有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进步、要素创新等理论为新质生产力的出场作了理论积淀。运用唯物史观可以发现，社会发展进步就是生产力从低质、旧质向高质、新质不断跃迁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9][27]}新质生产力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的现实力量。从历史逻辑来看，人类社会的演化历程从石器的使用到铁器、青铜器的使用，再到蒸汽机纺纱机的使用、内燃机和电气技术的使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生产力呈现出迭代升级的变化姿态；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国力强弱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高度相关，我们要把“失去的两百年”找回来，必须使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迁。从实践逻辑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弊端进一步暴露，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呈现光明前景，推进强国建设、统筹民族复兴，归根结底离不开新质生产力提供的“原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内生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具有一致性。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优化和升级历程，根本上与中国式现代化从理论萌发、实践发展到理论体系建构和实践方略完善过程是趋同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源性动力与新质生产力出场的内生逻辑具有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武器，清晰认识到要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作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核心问题的关键途径。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在理论的指导思想、历史的发展进程、实践的创造过程上都具有一致性，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和接力拓展的动力。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诉求、发展理念，也是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正是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诉求和愿望，形塑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因此，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逻辑根本上是一致的。

(二) 新质生产力的外显特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外源动力

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性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科技革命和科技现代化成为共同驱动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外源动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以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性为显著特征。新质生产力实质上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引领、高新科技驱动形成的新型生产力。就其发展水平而言,它代表着当今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种方向就是由高新科技塑造的,是高新科技赋能现代产业从而实现的生产力。高新科技使生产力各要素由量变的积累发生质变,促使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高新科技化,也必然带来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成为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31]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发凸显,没有科技现代化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32][23]},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要依靠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性是新质生产力的又一显著特征;高质量发展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成为引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目标驱动。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之“新”就在于蕴含观念新、涉及领域新,而“质”则鲜明区别于传统生产力“量”的投入,把目光投向“高质量”,技术含量高、知识密度大是社会生产力在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条件下衍生的新型高质量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更加符合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要求,关键就在于生产力的“新质”和“高质”,是能够更好适应新时代、新经济、新产业的新型生产力,对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外部目标驱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外源动力。发展生产力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同样没有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就是以生产力发展质量、空间布局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三) 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动力

坚持人民至上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价值驱动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为人民美好生活的生产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从根本上说,人民至上之所以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动力,还在于人民本身就是创造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动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工作重心,就是要消除旧社会强加在人民身上的经济、政治、文化束缚,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标导向。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还是要实现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就,才能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涉及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初心使命,就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动力所在。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拥有的深层价值驱动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何以拥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驱动力?这深蕴着“新质”与“新形态”、生产力与物质文明的逻辑,根本上就在于生产力发展方式上的超越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发展结果,必然拥有新型的

发展方式。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依靠消耗资源能源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强调绿色发展对于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实现了生产力生态化发展;它使新兴产业衍生的产业链越来越长,附加值越来越高,以新科技赋能新产业、催生新业态,呈现融合交叉、多点突破态势,实现了生产力融合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上突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引领和驱动下实现了新的突破。另一方面,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驱动。人类文明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演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先行者,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克服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固有矛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中心”超越了“资本中心”,以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以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超越物质主义,以和平发展超越对外掠夺扩张,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驱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四、以新质生产力激活和发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潜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33]10 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该民族的历史地位相当,那么,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总体跃升。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上就是在推进生产力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禀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素,它能以生产力全要素质量提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激活和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潜力。

(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规定性的方面。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党和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党代表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说要通过政党自觉把握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实现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符合生产力的自身要求,使生产力在内部要素上高效化配置,外部趋势上科学化部署,时空结构上合理化布局;另一方面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使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求政党提高认识和判断全球生产力发展新动向、世界科技革命新趋势的能力。如,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调整生产力布局,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引擎作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等。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驱动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政党自身的发展,形塑政党自身的先进性、主动性,从而以政党自觉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主动、历史主动。

(二) 新质生产力的高素质劳动者需求驱动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既是中国特色,也有潜在发展优势。关键就在于要把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强国,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列宁认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34]821 而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就是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32]110-111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自然以人才塑造和培养为根本,劳动者素质提升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面。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但需要拥有高知识含量、高科学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而且还要构建若干高素质人才队伍,不但要用好高层次、紧缺人才,也要用好企业家、技术工人等各类人才。可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必然也是塑造高素质劳动者队伍的过程,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助于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活力,这些都有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储备人才资源。这就要求我们要紧紧依靠新质生产力对劳动

者素质提升的契机,充分挖掘和培育人才资源,把人口规模要素转化为发展优势,驱动人口规模大国向人才资源强国转变,从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三)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要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以新促质”,即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3]。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引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生产力,它在创新科技引领、协调产业布局,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加快世界产业交流合作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实现经济动能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换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以高质量发展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过程,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改变拼投资、拼资源的老路,解决产业低端、附加值不高的问题,以科技创新创造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形成新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根本上就是要实现生产力发展动能、发展方式、发展格局、发展效能的变革,而新质生产力就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力,因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在驱动生产力全要素质量提升,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而加快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动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充分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潜力。

(四)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发展方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道路

新质生产力步入科技创新的新赛道,既着力解决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一是对发展目的和追求的超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11]861},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姓“资”姓“社”的本质区别。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12]439}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是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服务人民美好生活。二是对发展理念和方式的超越。新质生产力摒弃了资本主义先污染后治理的生产方式、“零和博弈”的发展思维,走的是绿色融合、共建共享之路,既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发展理念,又符合科学技术全球融通的特性,以开放包容、自立自强的姿态实现自身的发展。三是对积累过程和手段的超越。近现代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并不长,生产力水平却很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走过对外殖民、掠夺的道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靠本国人力、资源条件向内寻求发展动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现实依据。因此,新质生产力禀赋创新性、绿色化、开放性等优势,有助于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01).
-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01).
- [3]张 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37-148.
- [4]周 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5]胡洪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经济学家,2023(12):16-25.
- [6]魏崇辉.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理论与改革,2023(6):25-38.
- [7]于安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动力论析[J].上海经济研究,2022(5):67-76.
- [8]邹升平,程 琳.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生成模式与优化路径[J].求实,2023(4):4-16.
- [9]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0]杨乔喻.探寻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生成的原初语境[J].哲学研究,2013(5):3-10.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7]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7]薛永应.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大思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8]张文魁.经济增长视角的中国式现代化[J].改革,2023(6):1-14.
-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1]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7-08(01).
-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4]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收稿日期:2023—12—04 责任编辑:李俭国)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Zhang Lin

Abstrac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ultimately driven by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e sum of productive forces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continuous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to achiev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mutual change of productivity quality promote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modernization, while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promote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the productivity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enabling it to promot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ke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odernization; New productive forces are productive forces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abling them to dri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ized strong country with "primary task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lso a productivity that serves a better life, making it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ve the common value driving force of people first.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a new development mode and pattern has become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trend and value driving force of both in deep logic.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ll help fully activate and tap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